

读史阅世

闽侨史话

“隐士山坡”无隐士

□本报记者 谢海潮

1934年7月30日,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声势大振,之后对外以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”名义活动,临时奉命“相机袭取福州”。涉及这段历史,现今有的述评、纪事频频提到一处地名——“隐士山坡”,如谓国民党军“驻义井南端隐士山坡(含马路)扼守新店通北门楼孔道”及红军先头部队“与驰援隐士山坡的两排敌兵遭遇”,后续部队“主力向隐士山坡再次猛攻”。

凡事皆有出处,如湖北荆门何家山“山中何家姓居多,故名”。对于“地名控”来说,“隐士山坡”引人遐想,至于史上是否真有高士曾隐居此地,却是无从获悉。

“隐士”与“应石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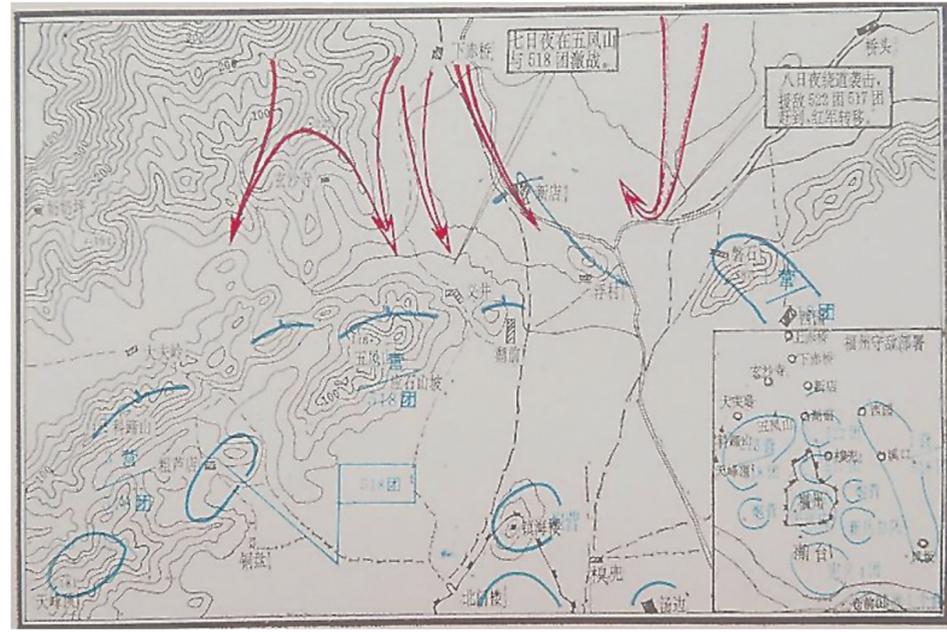
众里寻他千百度,却在提及“隐士山坡”这类文章偏爱的配图图中悟出实情,即“红七军团福州战斗经过要图”(1934年8月7日—9日),图上“驻义井南端”位置分明标的是“应石山坡”。

此图可从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》附录图表之“行军路线和战斗图”中查找,该书由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联合编辑(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)。

在“主要战斗概况·福州和降虎战斗”中,编者做相关表述:1934年8月初,以先到省的国民党军八十七师二五九旅五八八团部署城郊,其中第二、三营(各抽一个连为团预备队)驻西北坡,扼守应石山坡、五凤山、大夫岭、科蹄山、大腹山至洪山桥。7日24时许,红军先头部队与驰援应石山坡的两排敌兵遭遇。至8日凌晨1时,红军后续部队从猫头山占领玄(沙)寺,伴攻大夫岭,主力向应石山坡再次猛攻,集中十余挺轻重机枪组成火力网。敌依靠坚固工事和侧后重机枪掩护,居高临下扫射。红军几次强攻,未能奏效,至凌晨3时撤出战斗。

即便不通福州话,仅从字面上理解,也不难发现“隐士山坡”应为“应石山坡”的讹音。事实上,有关此处地名的正解及其讹变的源头均可在书中找到,关键在于读者如何别择去取,正如张舜徽评点毛奇龄“考古之功,未能邃密”所言:“援引既广,而多失于持择,又不覆检原书,故不免舛误错出。”

将“应石山坡”写成“隐士山坡”,显然难以“一地多名”为托词。其来有自,且在历代方志中流传有绪,如明万历癸丑本《福州府志》云:“出井楼



红七军团福州战斗经过要图

门迤西五里为卧龙山,有三石如品字,名品石岩,石圆而耸,叩之则诸山响应,又名应石。”

呼之“卧龙山”“伏龙山”“品石山”“应石山”皆是,几经沧桑,至近又见“龟山”一名,但规模已大为缩水。旧时山形今不复见,平整割裂后又分出多个地名,如《福州北门外湖前高氏族谱》所言:昔日的湖前村背靠龟山,并有五凤山依托,左右侧分别有品石山及化化山相互环抱。

所谓品石山即今“怡景小区”,化化山(山边池)在“湖前省直机关宿舍”,龟山整座山体“北起怡景小区,南至溢景苑第二座”,印(?)石尾“现铁路用地”。旧谱毁于祠堂火灾,新谱大体反映的是村人近十年的地理观,但必有因袭。

义井“土名”繁复

明人谢肇淛云:晨侵出郭门(井楼门)“五里至玄帝亭,折而西度,岭蜿蜒为卧龙山。其下为义井,山椒(山顶)三石鼎峙,为品石岩”。清乾隆本《福州府志》云:“马园山又名义井。”或传谢肇淛《游升山记》载马园

山“明太监养马于此”,今本却未见此语。按照林家棨的说法,马园山“在北门外七里义井村,俗名林老墓,又曰林厝山”,可补官史之阙。

史上在此“结草为庐”的名人,林信是有据可考的一位,但他并非“隐士”而是地位清贵,清康熙朝钦赐进士,官内阁中书。林信自记:“壬午(清康熙四十一年,即1702年)季冬,予与同人伯兄,既奉直公(其父林逊)柩卜葬于北山祖茔之次,因筑北阡草庐,以为岁时庐居祭扫休息之地。”后营建扩展,“乃筑楼屋一区,土室三楹,藩之以短垣,环之以曲磴,再加以以艺植”。300多年前的马园山“虎豹出没”,然“形势恢廓,培种松楸,仅三十年,冈峦上下,郁尔成林”。

林信称族人“其葬处皆聚北郊”,“窳窳相望,深合古人族葬之义”。在《榕胜待访录》书中,林家棨重申“十四世祖”林信“族葬之义”,指“马园山周围约三里”,“此山为余族墓,数百年来从无鬻土于他姓”,“俗名林老墓、林厝山,即缘于此”。另有族墓在玻璃山,“距城北六里,王墓村(太平山距城北五里,俗呼王墓村)北,义井

村南”。

又言“山北麓‘北阡’墓庐已圯废,山西北‘藤洞’石刻尚存”,林逊、林信两墓皆于“1956年建铁路时毁”。黄荣春《福州摩崖石刻》“北郊·卧龙山”一节未录“藤洞”,且谓乡民传说该地石刻均已“毁于20世纪50年代”。林家棨其书十六卷,虽印于2012年,实完稿于1934年,1976年重录成帙,予今或有事实上的些许出入。

旧时这一带山名着实热闹。《雁门萨氏家谱》指“北郊王墓文秀山”亦为祖山,萨容(字与相,号槐隐,清康熙壬子科即1672年武举)记“启土于康熙壬午仲冬之望”并筑“文秀草庐”,“墓亭距山百步,左接义井”。

时移世界,家谱逐代载葬“王墓山”“王墓一凤山”“义井祖山”“义井文秀山”“义井山”,乃至“龟山”“义井牛坑山”“重出互见。考其名称与实,可联系黄埔一凤山龙凤境、义井龙首境等境庙寻踪。“王墓”“黄墓”“黄埔”今俱作“黄埔”。

“阴石山”之草草

话说从头,“隐士山坡”一名来源

何方?

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》“参考资料”部分录有“东路军七八月份‘匪情’报告·‘剿匪’战斗经过”(1934年),内云:(8月)八日午前一时许,红七军团“以一部占领玄沙寺高地,向我大夫岭阵地佯攻,以主力向隐士山坡及沿新店通镇海楼马路攻击前进”。

其后“战斗详报”,警戒部署一为“第二营(欠一连)担任右至隐士山坡(义井南端高地含马路)起,至五凤山到大夫岭一带阵地”,继而陈述“增厚隐士山坡阵地之兵力”“驰往隐士山坡增援”“当即占领隐士山坡高地”等经过。

以上文字显系“编辑说明”提到的“还从敌方档案和报刊中选取了若干有关资料”,出自赣粤闽湘鄂“剿匪”军东路总司令部报告,原件均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。“收入本书的历史资料,已与原件进行过核对,均保持原貌”,在此处未作“明显错误”符号标明,无形中成了一道“坑”。

“隐士山坡”之讹并非特例,1945年2月福州市警察总队总队长谢桂成等呈报“敌伪动态”又见一说:日军“阴石山义井一带设有军用电话以传军情”。其时,“北门外义井田亩均被敌毁除开凿防空壕”,“五凤山遍设战壕,驻敌兵七十余人,日间疏散黄墓乡,夜则分住各山头”。

今日尚且难免“无错不成书”之讥,但毕竟还有见报差错“一字扣十块”等惩罚节制。民国时期地方官文混乱若此,亦见其规章之草草。谬种流传,贻误至今。《粟裕传》(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)从编写筹措、资料准备到最后完成,经历时间较长,而在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”一章,尚云“夜幕笼罩了福州北岭,北门外的里洋、笔架山、隐士山坡一带高地一片漆黑”。

仅隔30年,“恢复高考时调用《毛选》第五卷用纸”已传得有板有眼,刘海峰在考证《刊于2007年》中感叹:“即使是离我们不远的当代历史,即使大多数过来人都还健在,也存在着历史叙述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形”。

吾恐“不辩不明”,“隐士山坡”这一“民间词源”在“历史层累说”演绎下,犹如“杜十姨”之于“杜拾遗”、“桃林村”之于“涛邻村”、“恶发殿”之于“握发殿”,将来真的冒出一位“世外高人”来。

乡土琐记

福安狮峰寺

□彭惠妮 孙群 文/图

狮峰寺原名西峰寺,位于福安市溪柄镇楼下村,始建于唐景福元年(892年)。明永乐年间,寺庙从山顶移建于山麓,改名狮峰广化禅寺。经历次修缮,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狮峰寺坐西朝东,位于柏柱坪盆地边缘,前方马上山作为朱雀之地,是风水模式中的朝案山,而背后的狮子峰形成玄武山,左侧虎头山



般若堂和莲花池

等群峰叠嶂,形成青龙脉之势,右依后笔架山,呈白虎之态。寺前一片平原,寺后群峰俊秀,地势形成“左青龙,右白虎,前朱雀,后玄武”的山水模式。

如此选址有诸多优点:天然的景观背景,带来绝佳的大环境,利于僧侣打消各种欲望,安心修道;寺庙隐于盆地之中,周边为茂密森林,冬暖夏凉;山中有一口清泉,利于僧人用水,山脚周边林地可耕作,自给自足。

狮峰寺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,中轴对称式布局,由东向西依次为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、法堂和圆通殿,两侧翼建有禅房、僧房等。主要有山门、小山门等次要建筑,以及放生池、园圃、卧牛石、聪明泉、鱼池水景等园林景观。从山门到天王殿之间,菩提叶形的园圃,27级高高的台阶,两株百年古树,渲染着佛教意蕴。寺庙各区之间运用廊道连接,构成多个院落,营造出虚实相间、动静结合的建筑环境,雄壮典雅又不失灵气。

天王殿建于清光绪二年(1876年),单层歇山顶,鸱尾脊,屋檐施以灰塑,脊正中凸出两层作楼阁造型,俗称“太子亭”。天王殿山门朝东而开,出檐下墙头顶部运用大幅灰雕彩绘装饰,涵盖植物花鸟、人物故事、诗词歌赋等题材。门两侧方形龛内则是以禅寺为题材的诗文。台基面朝柏柱坪盆地,远眺群

山,外设直棂栏杆,是寺庙绝佳观景台。

大雄宝殿始建于唐景福元年(892年),现存建筑为明万历四十年(1612年)重建。大殿是狮峰寺最核心部分,建筑制式最高,为宫殿式建筑,保持并延续了唐朝寺庙建筑风格,重檐歇山顶,顶脊两端饰作鸱尾脊,中间堆塑双龙抢珠,屋脊装饰缠枝花卉。大殿四周的窗梁板墙精细雕刻着各种图案,青砖墙壁上绘有各式人物故事的壁画和楹联。佛寺一般于大殿两侧建钟鼓楼,然而狮峰寺较为特殊,在殿内左侧架起一面圆鼓,右侧横梁上悬挂了一口铁钟,以此代表钟鼓楼。

般若堂也称法堂,建于清嘉庆十五年(1810年),系单檐悬山顶木结构建筑,屋面平整,两端鸱尾脊高翘。整体建筑为半封闭式两天井的矩形院落,主楼前堂三间相通,上书匾额“般若堂”,次二间为僧房,稍间面向两侧,为厦间和书厅。庭院为半开放式环廊设计,中为天井,便于通风与采光。天井中植花栽树,养鱼设景,巧设雕像,形成动静结合的妙景。

圆通殿也称观音殿,建于清嘉庆年间,是狮峰寺地势最高的殿堂,单檐悬山顶纯木结构建筑,脊身素平无装饰,两端鸱尾脊,博风板钉有木刻悬鱼。面宽七间25米,进深两间6.37米,呈“凹”字形平面布局,主楼为双层木结构,楼上为禅室,供往来



天王殿山门

香客借住;楼下明间为观音殿,左右次间为禅房,前廊宽1.3米,廊道边成排饰做美人靠,供人休息。殿堂中间形似太师壁,中间设置案台,放置观音佛像。

小山门位于大雄宝殿之后的花岗岩石基上,于民国时期所建,为过渡空间建筑。人字形屋顶,左右两侧坐落着莲花状的鸱吻,基座为石雕莲花,端丽雅正。门面山门只有一个,圆拱状,两侧有方龛门,代表另外两门,而后山墙有方形抹角,欧式风格浓烈。门上题字六个,由上正中为灰塑雕饰宝相花,两个有红色方龛,内有诗文,然年代久远,诗文已经模糊脱落。圆拱门和方龛门均用彩绘卷草纹,通体素白,崇高圣洁。

园林造景离不开山水,狮峰寺也不例外。寺庙地处山麓地带,遵循“师法自然”的原则,引水造景,借石造景,形成金鸡石、蛇头石、

卧牛石等石景。其中,卧牛石位于大雄宝殿左侧,地铺白沙,篱笆围合,岩石错落有致安放其间,上书“卧牛石”三字,形成大殿与僧房的过渡空间的小景观。观音殿左侧堆石造景,岩石堆砌围墙,地铺黄沙,栽一圈花木,远借狮子峰为景,近借古柏花木为景,远近交融。院内还有诸多石雕小沙弥,或位于莲花池和鱼池旁,或位于天王殿前的高台,或位于大殿后廊道内,与盆栽植物融为一体,展露禅风雅意。

寺庙内植被保存完好,院内最古老的树木当数聪明泉旁的苍柏树,高14米,枝繁叶茂,郁郁葱葱,据《狮峰寺志》记载,树近千年,相传未有此寺,先有斯柏。寺内还种植有桂花、桑树、山茶花、竹子、寒梅、圆柏、杉树等。最常見的就是各式盆栽植物,月桂、夜来香、矮松、杜鹃等应有尽有。

“世界大同”践行者

□本报记者 陈梦婕

历史上,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。早期闽商海外发展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在“南洋”地区,“下南洋”也就成为明清时期闽商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路径。白手起家的福建先民遍布各行各业,在当地编织起绵密的贸易网络,也逐漸涌现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。

英国人约翰·福尔曼在《菲律宾群岛》一书中谈道:“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,没有他们,生活将极端昂贵,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,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。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、工业和有效劳动等概念的是中国人。”

根据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鸿阶的研究,在不同历史时期,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,闽侨经营行业差异性较大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,闽侨以经营工商业为主,如印尼闽侨主要从事胡椒、椰子、蔗糖等经济活动,马来亚闽侨以经营橡胶种植、加工出口工业为主,新加坡闽侨大多数是经营转口贸易,菲律宾闽侨主要经营蔗糖、椰子、苎麻、大米和烟草等土特产,越南闽侨则从事商业、米店、五金、钢铁和咖啡等生意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东南亚国家相继独立,纷纷由殖民地经济转向民族经济,闽商成长获得空前机会。在此阶段,闽商经济从单一的商业资本转向了产业资本,除了经营海运陆运、房地产及金融业务外,经营领域还扩展到造船、橡胶、制糖、罐头、肥皂等生产部门。

李鸿阶表示,这个阶段,东南亚闽侨资本已与当地民族经济融为一体,带动和促进了住国的经济结构转换,促进其经济多元化发展,也为当地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机会。此外,与华侨华人族群经济、祖国经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,具有一定的跨国中介和跨国经营特性,其商业版图范围往往横跨多个国家。

除了商品贸易,采矿业是战前闽侨经营的第二个重要行业,尤以马来亚最为典型。永定人胡子春年仅13岁就跟随族人前往槟榔屿岛谋生,投奔姑婆家,20岁开始涉足矿产开发。1901年,胡子春投巨资购买了先进采矿设备并注册了端洛矿务有限公司,同年12月12日的《马来邮报》称之为“东方设备齐全、先进、完善且规模最为庞大的矿场”。

闽商还率先经营种植业,奠定了新加坡、马来亚种植经济的基础。被誉为“马来亚橡胶王国的四大功臣”中有三人是祖籍福建的闽商。马来亚的橡胶栽培始于1877年,但商业性栽培是在1895年前后。最早提倡种植橡胶的林文庆和陈齐贤均为福建海澄人。在泰国,闽商许沁美从福建龙溪招募工人到董里种植橡胶,开创了泰国的橡胶种植业。闽侨还在菲律宾、越南、马来西亚开垦荒地,种植水稻,使侨居地成为住在国主要的产粮区之一。

20世纪初,东南亚各殖民宗主国卷入一战,华商资本趁机崛起,金融业由此成为闽侨经营的重点行业。新加坡的华侨银行、华商银行、和丰银行、大华银行、华联银行、万兴利银行与广利银行都是由闽籍华商创办的,涌现出如李光前、林秉祥等一大批杰出企业家,同时也为住在国培养了大量企业管理人才。

躬耕商业领域之余,闽侨也不忘积极回馈当地社会。新加坡是热带瘴病之地,19世纪初,那里疟疾、霍乱、天花等各种疾病滋生蔓延,福建社群领袖陈笃生捐资在珍珠山上建立平民医院,这所医院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陈笃生医院,其遗孀李淑娘及儿子陈金钟继续其未竟事业,现已发展成为新加坡第二大医院。

1857年,永春籍闽侨陈金声捐助当局兴建自来水库,由新加坡中部的麦里芝引水至市区。为纪念他的功绩,当局在伊丽莎白女皇道上建造了一座陈金声纪念碑。喷水池的底部用英文刻写:“此喷水池为市政当局所建,以纪念陈金声先生捐献捐助新加坡自来水工程。”

1953年,同安籍闽侨陈六使创办海外第一所华文大学——南洋大学,不仅让成千上万的华人子弟不至于深造无门,而且为新马两个新兴国家栽培了工、商、文、教、政等各界急需的人才。南洋大学毕业证书从左至右依次为中文、马来文、英语三种文字。校徽由一颗星和黄、蓝、红三道光圈所组成。黄星象征南洋大学,黄蓝红三道光环依次象征华、巫(即马来族)、印度三大民族,寓意多元民族和谐相处、多元文化融合共生。

有30万人口的诗巫如今是马来西亚沙撈越的第二大城市,至今这里仍有闽侨人黄乃裳的雕像及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、街道、公园等。100多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蛮荒之地。维新变法失败的第二年,与康有为、梁启超同在清王朝通缉令上的黄乃裳流亡来到马来亚,恰逢当地正在推行“港主制”的移民政策。黄乃裳与诗巫当地土王订立盟约,从家乡招募了1000多人,这些人中除了农民,还有传教士、商人、医生、教师等各种人才。

从其组成便可以看出,从一开始,黄乃裳便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、新的生活,他还用家乡的名字给这块土地命名——“新福州”。这些怀抱梦想的建设者从福州出发,双脚踏上甲板的那一刻,命运就此改变,而南洋也因为他们的到来而改变。

无论是在母国或是居住国,华侨都是“世界大同”理想的践行者。